

北海文史

第十一辑

人物·掌故

为广州建城作出重大贡献的姚文式

姚文式，东汉合浦人。建安中(公元196年—220年)举茂才，任交州治中(为州刺史的助理，掌管文书案卷)。

赵佗立南越国，在番禺(今广州)的秦城基础上扩建都城，俗称“赵佗城”或“越城”，是广州城的雏形。汉武帝元鼎六年举兵南下，南越灭亡，越城遂废。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交州州治从广信(今梧州)迁广州，刺史步骘初到南海，览土地形势，叹曰：“斯诚膏腴之地也。”认为可在此建筑州城(交州首府)。询问有关赵佗旧城遗址，没有人说得清楚。只有姚文式敢于发言，他说，赵佗旧城，应该与番禺毗连，今(南海)城偏东南处有水坑，(赵佗)陵墓与城郭“都倚傍水坑之上，县民称该处为番山”，县名番禺，即“所谓番山之禺也”。赵佗归附汉朝，曾“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之处，据此推测，赵佗宫阙和城址就在附近了。经登临勘察，果然发现旧城遗址，于是“重理尉佗旧治，扩番山之北以广故城”。遂奠定今广州城市的最初基础。千百年来，广州成为南粤的政治文化中心，姚文式的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据《后汉书》有关列传和《合浦县志·乡贤》以及《广州之最》整理)

(《北海晚报》)1996年7月16日)

善辩得重用的张重

东汉张重，字仲笃，合浦人，好学而才思敏捷，善应对。在当时岭南颇有威望，故被合浦郡刺史向朝廷推荐，委为日南郡(今越南中部)从事(相当于刺史的助理)，具体负责考察官吏政绩，来到洛阳。汉明帝见他五短身材，有点看不起他，故作揶揄问：“你是何郡的，当的是是什么小官？”张重心领神会皇帝的“宸衷”，特加重语气回答：“臣张重，是日南郡计吏。陛下用人标准是重才呢还是秤皮肉轻重呢？”明帝觉得他答得有意思，从心里改变了态度。

元旦大会群臣，张重亦在被召之列。明帝对他特别客气了。用请教口吻问他：“日南郡是在北面才看到太阳吗？”张重答：“传说云中有金城，不一定是事实。日南郡的太阳亦从东方出西方没，与中原并无二致，只有气候温和罢了。随官民各自不同方位，仰看太阳，日影便有东西南北以及向背不同的感觉。所谓日南，与中原相对是日域偏在南方之意。”明帝更加赏识他的学问和表达水平，当即赏赐他许多金银布帛。从此，张重凡因考察官吏差事到都城时，明帝必召见他询问疑难，他都一一解答详明，每次都得赉赏和加封，终于位居显要。

(《北海晚报》)1996年10月8日)

名动朝野的合浦神童王汝弼

明朝永乐年间，合浦县山口人王汝弼，本是一位农村孩子，可是凭他早熟的智力，居然名动朝野，成为天下皆知的神童。

王汝弼早慧强记，且受名师梁海门先生扶掖，成为县学中年龄最小，成绩最优的县学生员，后经教谕推荐，县令府尹逐级上闻，惊动了北京金銮殿上的永乐帝，特派专官前来面试，文题《顾鸿雁》。王汝弼不假思索，挥笔立就百字论文，立论既奇，言亦警策，如果不是面试，简直难以置信文章竟出7岁孩子之手，文章上呈御览，帝为动容，叹为“真神童也！”

可惜的是，这朵早熟的花朵仅仅绽开12年便凋谢了！应了“神童”而不是“神人”的称号。

神童夭折，天下惜之！厚葬在山口镇田寮村后，墓在“文革”中遭彻底破坏，原有墓室挖毁，室砖、墓碑无存，仅余一残缺石香案，凭此便可想象，此墓原貌气派非同寻常。民间传说墓碑为永乐帝御笔，仅属传说，已无法进一步考证了。

(《北海晚报》1996年6月12日)

洗心革面的粤海大盗阿婆带

拙文《禁偷(抢)谣》见报后，两位读者来信质疑，一是要求对阿婆带事迹有更多了解；一是对杀人越货、横行南海的匪首居然向官府投诚而且当起教书先生，表示怀疑和不可理解。对此二个问題，只能凭借能够收集到的资料，与二位朋友和广大读者进行探讨了。

阿婆带，本名郭学显。一说广州人？原是孤儿，被姓薛的婆婆收养，故又有薛婆带、郭婆带和阿婆带诸名。在嘉庆十五年(1809)向官府投诚前，他已拥有船只90余艘，火炮400余门，匪众5000余人，成为与张保仔、乌石二和东海霸等股势力相当，并使“官兵莫敢捕治”的“粤洋巨匪”。

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间，阿婆带曾到北海剽掠，被廉州知府张世倬、合浦知县马倚元率官兵赶走。此后再无到合浦行劫的记录。

阿婆带虽是匪首，但个性好学，他的指挥船舱无疑是座移动图书馆，经史子集等书籍“无一不备”。舱门自撰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冠带立于朝。”集《四书》语句为联，可见这位匪首学养不浅。对文中委婉道出他之为盗，是出于对沦丧世道的反抗和腐败官府的不齿，但不管如何，破坏社会安定和生产，使民不聊生的盗匪行当，都是对天道人道的逆反。故此不敢苟同《两般秋雨庵随笔》作者把他看成是“盗中之有道者，”充其量只是“盗中之可救者”。有如下表现可以为据：

阿婆带毕竟与张保仔、东海霸和乌石二等匪首不同。所以他与张保仔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将张保仔手下的人擒杀并夺取他的船只。但他多少尚保持一点儒家中庸思想与江湖义气，并不像张保仔向官府投诚时，以出卖同道，协助官兵诱擒乌石二作为代价。他是最先向两广总督百龄投诚的一伙，虽然官府照例授他“把总”官职，但此后并未见有关他“随同(官兵)捕盗”，并执行官府命他“将张保仔擒斩”的记录，而“予以官爵不受”(辞谢把总官衔封赏)。他辞官后，在广州买屋一间，教他的子弟读书，安分守矩。韬光隐晦，自奉俭约，“以布衣终(老)。”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嘉庆朝实录》《合浦县志·前事记》等综合整理)

(《北海日报》1996年12月2日)

老鼠不吃坑边禾 江洋大盗“水蜘蛛”林中月

一个拥有20几艘船艇和200几人抢，横行北部湾十多年，以外国轮船和洋财为主要猎物，但从不伤损北海地方一根毫毛的江洋大盗林中月，颇有点传奇色彩。这个黑道人物的事迹，经多年追踪搜索，仅得蛛丝马迹，从中可窥见他为人

时一斑。

林中月是北海龙潭上村人。自幼勇武好义，广结交，练就在海面“爬行”如蜘蛛的绝技，因有“水蜘蛛”绰号。同治、光绪年间，钦廉地区各种秘密会社迅猛发展，以钦州黄明堂为首领的“三点会”会众最多和分布最广。林中月此时已是海上的霸主，成为三点会的大头目，他以三娘湾为基地，经常出没于西至中越边界，东至涠洲的广阔海面，以法国轮船和涠洲天主堂为主要猎物。据北海海洋关档案纪录，光绪后期，常常航行香港—北海—海防线的轮船(法国籍的多)不时遇匪截劫。二十二年(1896)涠洲法国神甫向廉州府报警：“200名海盗抢劫涠洲。”二十四年(1898)“涠洲岛数度遭海盗劫掠。”均被“官兵”或“岛民”击退。虽未言明作案者属何股何帮，但据当时海面“匪情”分析，除了林中月，其他属于“小买小卖”的小股海盗，断无此胃口和能耐，敢捋使国人闻而生畏的“老番”一根胡须的。又据龙潭村知情的父老说：“林中月做贼，‘老鼠不吃坑边禾’。从未到过北海地搅扰；有年灾荒，北海街有人抢米抢当铺，他派人从海防运一船米救济龙潭人。”这是对林中月的为人仅有的口碑讯息。

光绪中末叶，黄明堂参加孙中山的革命队伍，成为孙中山倚重的忠实将领。林中月在此时期内，再无发现行劫的纪录，而是携带小老婆在海防作寓公“叹世界”（闲居享受）了。

之前，廉州府官曾经屡接河内法国总督通过北海法领馆关于协拿林中月的照会。故在越南和钦廉各地暗布“蜘蛛网”和眼线，公开悬赏通缉。二十七年(1901)，林中月被“使妈”告密，在海防落网。同伙27人亦先后在各地被擒。文献说是法国驻北海领事“应廉州府之请，把‘著匪’林中月等28名”从越南引渡回廉州“南门外(按即今合浦县政府门前，称‘杀人坡’)处决。”这个本事高强的“水蜘蛛”竟然成为华洋交织的大“蜘蛛网”的猎物而丧了性命。父老们的置评是，林中月老鼠不吃坑边禾稼，从乡情道义上说属“盗中之有‘道’者。”如从法制观点说，他不走大首领黄明堂革命道路，虽然后来不作“冯妇”，亦难免“盗者”的杀身下场。

(据《北海杂录》、《钦州志》和采访口碑)

(《北海日报》1996年9月5日)

钦州贡院“鬼案”

钦州贡院原址在今钦州市政府院内。民国元年，久已封闭不用，杂草丛生，雨水滞积。随着科举制度的久废，它已被人们遗忘，如不是因为发现其中“有鬼”，谁也不屑对这间废院看上一眼。

“鬼踪”是因为入夜从院内传出的银铛铁锁声而被发现的。居民中的大胆好事者，相约非看看鬼的真相不可。夜色朦胧，院墙之上，一名勇敢者屏息静观院内动静，墙下多人亦贴耳仰首，静候墙上人报警。果然银铛声起，自内而外，墙上人循声窥察，看得真切，哎唷一声，失魂落魄，幸有墙下众人接住才免跌伤。惊魂甫定后，述其所见：一个全身长毛，两眼如灯盏的怪物，拖着铁锁，从内院踉跄而出，银铛声随着步武节奏而发……于是“贡院有生猛鬼怪”的奇闻迅速传遍全城。附近居民徙避一空。

钦廉镇守衙门因事关治安大碍，次日即派兵勇多名，会同保甲里正，巫覡道士人等，一应捉鬼伏魔之事均备，众人破门而入，在后院廊庑之下，“鬼”被惊扰一跃而起，被众人擒住了。原来，这是一匹老病马，鬃鬣蒙茸，一副骨架，一双陷凹的眼睛特别有光，颈上还系着半截子铁链。经查明，此是宣统三年新军统领郭人漳因镇压钦防起义革命军用兵，驻军于此，病马此时遗下。此马饥食皆除杂草，渴饮庭中积水，得以苟活。贡院鬼案，真相大白。

(《北部湾报》1991年1月11日)

冯子材墓有“疑冢”之说

座落在钦州东15公里泥桥岭边。属于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晚清抗法名将冯子材墓，墓右200米处建有神道碑和亭。这位终于“太子少保尚书衔、贵州提督、世袭轻车都尉”等一连串头衔，并被赏赐黄马褂的有功之臣，曾有两篇溢美备至的墓志碑文，一见于《钦州县志》的《冯子材墓志》；一见之冯相钊的《战胜法兰西始末记》的《御赐冯勇毅公碑文》。但其中任何一块碑刻均未见过。为什么？笔者带着这个疑问，于1981年专门走访了钦州有关人士，均说不出所以然来。后因偶然机会，在街上遇到一烟贩老头，攀谈掌故，免不了冯官保与刘义话题，当谈到冯墓时，老头漏言：“此坟是假的！”经穷追究竟，颇费唇舌才逗出端

倪：“我青年时听说冯官保死后坟中放有供点长明灯用的几缸生油，几个朋友曾进行偷坟，挖下去连棺材也没有，岂知是座空坟，白费力气……”且不必全信这位自称掘墓人的话。但可以推断的是，冯墓建有墓室，陪葬物决非一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地面显耀的坟墓建制不可能不预想到地室的防盗措施的。因此，除上面提到的墓志碑刻何在问题；也有墓主人死的时间与下葬日期相距为何很长的问题值得思考。按冯子材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历(下同)七月二十七日，下葬于三十三年(1907)三月十二日。就目前看到的建墓工程包括择地在内的时间，大可不必跨越三年多的工期。如果没有看不见的、更复杂的墓室暗穴营建工程是说不过去的。加上钦廉地区民间流传有关冯官保葬地的种种神秘诡异的故事，更加深了上述的可能性。如果墓室之说成立，则墓志碑刻埋在地宫之中的推断就属可靠的了。据此理由，掘墓人的说法就不能说毫无根据了。当然，这都是推论，“疑冢”之说只能算“一家之言”，未可当真。

(《北海日报》1990年4月16日)

崩沙口与冯子材

北海海关以东，沿着珠海外街的航道工区、粮食局直至游泳场以东一带，过去统称为“崩沙口”。此处南面高坎均属沙质土，雨水冲刷和海浪侵蚀形成多处沙土崩塌的缺口，故有此地名。这里今已拓建为中山东路至茶亭路一段街区；北面海滩已建成海堤，即滨海路。沧桑巨变，陈迹已非。其中发生的一段历史掌故也与它的地貌地名一样，至今鲜为人知了。

话说一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渔民和海上商贾上下必经的通道，附近“四馆”(烟馆、妓馆、赌馆、酒馆)和各种摊档林立，日夜开业，十分热闹。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这里摆粥摊的黄五，浑名“卖粥五”的，收留了一个钦州来的流汉作帮工，年岁二十左右，黑瘦矮小，浑名“黑四”。此人干活勤快，不妄言笑，人缘又好，加上一手绝招：收的碗碟从顾客头上飞过，一个个“叠”入一丈以外的洗碗盆中而毫无缺损，工作效率高，又广招徕，很得卖粥五喜欢，多有赏赐。可因为他食量倍人而渐招卖粥五婆讨厌、奚落。黑四隐忍，是看在为人厚道的五叔分上。日久口舌多，为免却五叔为难，黑四求去。五叔挽留不住，赠些银两衣

衫，打发他往廉州彭团总处投军。

这个“黑四”，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抗法英雄冯子材。1885年，冯带着“官保”的荣衔，从镇南关回到北海，特地在崩沙口下马，找到了卖粥五。五叔吓得慌忙匍匐叩头：“小人该死，有劳四哥，不！官保大人枉驾，恕罪！恕罪！”冯子材双手把他扶起：“岂敢！岂敢！当日非五叔关照，子材焉有今日！”还问了家常和五婶平安？在众随员拥簇下前往大西街巡检衙门下榻。卖粥五婆闻知，又怕又愧，托病不敢露面。那卖粥五好不光采，逢人说“咱官保大人来啦！”自有一班人前来巴结，他一下变成北海的红人。冯子材征得五叔不愿当官意见后，特地送来一笔银两，嘱咐：“购置房屋一间，剩下留作养老吧，不卖粥了。”五叔感戴照办。这房产就在“公猫行口”（即今民生路与中山路交叉处）。门前悬挂一对红字灯笼，上书“官保赐产”字样，直到民国初年，七品以下官员过此都例行下马而过。

（《珠海遗味》1994年4月）

李三少之死与钦廉归属之争

钦廉四属（合钦灵防）在宋朝本属广西邕州的“桂管”，元朝始归属广东中书行省，是“下四府”的一部分。明清至民国初年，两广新老军阀都为这块地盘的归属问题大动笔墨和刀枪。广西持地理历史为理由；广东以民情风俗为依据，甚至把玉林博白等地也算是广东的，各为争得与保有这块地盘作不择手段的角斗。民国初年在北海枪毙的李三少，便是这场闹剧中的替死鬼。

李三少名怀祖，廉州平田人，排行第三，父亲李起高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总兵，其兄李怀本镇压“三那抗捐”亦建殊功。李三少作为箕裘望族子弟，自必成为说话算数的地方物望，故为钦廉镇守使隆世储所延揽结纳，尊为座上宾。隆某原是广东督军莫荣新（桂系军阀，袁世凯的亲信）的手脚，以此夤缘，受到洪宪“陛下”封“三等男爵”的殊恩，故一切仰承主子鼻息行事。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中秋之夕，隆镇守在廉州官邸，特设满汉全席盛筵招待地方绅商名士，酒过三巡，主人开腔了：“今晚承诸公屈驾赏光，卑职宠幸至极！所以借重诸公者，乃是钦廉地方何去何从、关系至大之事。”接着是一大套天经地义的理由，归结为一句：“归属广西是势所必然！”当即要客人在事先拟好的请愿书上签名，此时，半

含醉意的宾客被这突来的闷雷炸醒了，有先后借故溜跑了；有在李的诱导下签名的。

这一闹剧激起旅居京、省同乡们的公愤，一时间，谴责通电纷传，朝野传为笑谈。隆毕竟敌不过“地头蛇”的压力，只好卷铺盖溜之大吉。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广东第四路军总司令黄明堂进驻北海，时全省正是“推翻桂系统治”，粤人治粤，，呼声叫喊最响之时。李三少即被黄明堂逮捕，以“出卖乡土”的“粤奸”罪名，在北海西炮台枪决。当时，用敞篷轿将犯人押往刑场，行到今珠海西路“德盛昌”门前，他要求暂停，嘱咐亲戚为他办后事，神态安详。可是两广的矛盾并未因此而解决。嗣后，八属军的统治与被推翻以及第二次粤桂战争，无不与地盘之争有关。回顾前事，简直是儿戏一般。

(《北海日报》1984年11月29日)

经济学家龙大均

龙大均(1903—1985)字詹兴，广西北海市人，出生于渔民家庭。家贫好学，自小开蒙于名塾师黄日章私塾，中学时得合浦绅士王子万资助，1922年考入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被选派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半工半读。1933年在巴黎获法学博士学位，后转攻经济政策。同年，代表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4年在南京任《中华月报》主编。1935年发表《币制改革建议》一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采纳制订“法币政策”。著《1935年世界经济》一书，兼任山衣大学经济系教授。1939年在香港为英国远东情报处翻译《英德开战及其外交文件》(英文)一书。1940年，应“中央海外部专员”吴铁城聘任主编《华侨先锋》半月刊。1942年在重庆“国家总动员会议”专员和秘书任上，对全国战时经济动员和物价管制等方案多经手审核。1944年，起草《取缔反限价议价条例》。任专门委员。主持“对敌经济作战策划”和制订《抢购沦陷区物资》策略。1945年9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经济)参事”，对国内“财政金融法规”曾参审议。1946年返北海与邓世增竞选“国大代表”，因财力不逮而落选。

1950年返大陆，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在长春商业专门学校任教。

1952年在沈阳东北财经学院任教。1955年肃反和1957年反右运动均属对象，

二度入狱。1979年落实政策平反改正后退休。1985年2月病逝于上海。终年82岁。晚年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是上海民革市委区支部的活动分子。

(《北海日报》1990年3月29日)

著名书画家薛孝田

薛孝田，字之农。生卒年未确，六十年代在世。北海市人。家住珠海东路。青年时，心仪合浦名书家张午琴和道州名书家何子贞，擅悬腕作行草书。其画学钦州林昶及合浦曾其藻等名家的水墨花鸟，山水宗“米家”技法。50岁以后，岭南派名画家赵少昂在广州湾设馆授徒，他慕名自费前往执弟子礼，画风丕变，用色艳丽，与深厚的传统功底结合，创自己的风格。所作山水突破传统循循相因故步而注重写实，先后在桂林、广州等地作了大量的写生稿。花鸟亦以色彩明丽见长。作品多流传越南和东南亚，晚年寓居海防，以卖画为生，是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北海籍画人。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回北海闲居。笔者因父亲是他书法弟子的缘故，曾在他门下习水墨山水，他主张从临摹入手，熟练后可不拘成法，自创门径，并强调笔墨应随时代而变，不愧是革新派的画家。后复往越南，不久病逝于海防。

(《北海日报》)1990年6月4日)

北海第一位抗日烈士黄亚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枪声宣告中国大劫难开始。僻处西南沿海一隅的北海，因军事地理决定它亦非桃源乐土。9月，继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淞沪会战亦进入第二阶段。25日，日本战机一架和战舰一艘同时入侵北海。27日，日舰接近冠头岭海岸不足1000米，发炮轰击冠头岭我军的前沿阵地；特别以南岭为重点目标，着弹最为密集。

日本侵略军这次在西南沿海的军事行动，意图不外是：为淞沪会战大张声势，给中国人造成心里压力；为必要时在大西南实现海上突破口的战略作“投石问路的试探”。诚然，在“七·七事变”发生未到三个月时间内，西南沿海便已掀起鲸鲵的浊浪，足以证明日本的侵华全局战略方案早已未雨绸缪，成竹在胸了。

恰好北海守军桂军175师1045团2营已于9月初进驻布防，在冠头岭和沿

海一带前沿阵地开挖了战壕，钢筋混凝土碉堡尚来不及修筑。27日战端一开，防守在上述地段的某班班长黄亚全，为掩护战友安全，冒着密集炮火，迅速跃入危险性最大地段的战壕中，命令战友迅速转移。之后，自己正举步离开时，一颗炮弹已在身旁不到5米处开花，这位年轻班长黄亚全的脑袋与一截右臂随着弹火而消失。黄亚全成为北海抗战史上第一位捐躯的烈士。事后，北海各界群众，学生与驻军一起数千人，在中山纪念台广场举行盛大肃穆的追悼会，声讨日寇侵略罪行的口号声震彻北海上空。烈士的热血使全市人民深受爱国主义教育，万众同仇敌忾。追悼会为后来如火如荼的抗日群众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烈士遗体经厚敛葬于马鞍岭南坡之上，即新修复的神农庙右侧。笔者在最近访得烈士墓于丛莽中，所幸这被人遗忘的孤坟，墓碑犹存，使曾经八年抗战忧患的人得其马鬣故封。特志本文以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六周年；并作为在北海捐躯的一切抗战烈士英魂之祭。

(《北海日报》1993年2月7日)

诗联讽贪官

时下提倡廉政，而解放前为政不廉者不少。

民国初，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为洪宪登极皇冠觅大珠而假权暴敛，贪贿无节，合浦县民恨之入骨。廉州名士某成诗云：“珠生合浦货财窠，空手而回你肯么？民富官穷真枉费，官贪民怨又如何？孟尝高洁家财薄，马援清廉罪咎多。身后声名谁计较，且操权柄广搜罗。”口语道白，妇孺都解，道出赃官墨吏胸腔，至今尚为谈助。

建国前，合浦县长宁可风(灵山望族也)，去任之日，县民赠联云：“宁可风吹归大海，不教秽亵污廉山。”盖宁氏在任，不守清行而政绩不显也。以尊姓大名敷衍成句，颇见巧思。又县长李本清，暴敛贪鄙，贿赂公行，终被法办解职，县民燃炮欢呼，如送瘟神，好事者拟一联云：“李本不清，恶果自吞天有眼；花县蒙污，民膏都尽地无皮。”与上联同一机轴，而谑虐过之。

(《北海日报》1988年11月22日)

合浦“县长”夏秀峰被捕内幕

1944年前后任合浦“县长”的夏秀峰，是继李本清之后被逮捕法办的第二个“县长”。在当时，县民拍手称快；在而今，父老们仍乐道其臭史。

夏秀峰，合浦县夏屋垌七里村人，“少将”军衔。未任“县长”时，恃在官场的夤缘，称霸乡曲。家乡有所小学在周江口村，因不便其子女上学，不顾公众反对，设法把它迁到七里村，为此与时任一中校长、在官场中亦能上下其手的周江口人周胜皋发生矛盾。夏秀峰当上“县长”后，毫无造福桑梓之想，一心只在“京兆三日”任内搜刮民膏以自肥。对于贪赃索贿，他的“名言”是“快刀斩乱麻，到手始为财，多不如少，少不如现。”（出处下详）财贿当然多多益善，当一口吞不下时，不妨分几口，到口才算口福。这就是夏氏的《官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疏虞，是不能一一细审每口猎物是否隐藏钓钩，结果他吞着毒钩，馋吻被钩住了。

当时属合浦县的小江宋家，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官僚豪绅宋安枢家族，财雄势大，地方与官府的事，稍不如意，他们说个“不”，断无人敢说“是”。况且当时他们在中央有人——空军某部小队长宋德孚。夏秀峰不识好歹，竟然向这样的家族“敲竹杠”，该他倒霉的了。夏秀峰借筹集“剿匪”民团经费之名，敲宋家一笔，不就，便以“通匪、容匪”罪名相加，这顶大帽子宋家担戴不起，请求“通融”，经讨价还价，答应宋家减半捐输“剿匪”经费，但暗示要另送一笔“通融费”。宋家不甘，但迫于情势，权且就范。夏氏即写密函一封，交其亲信爪牙、时任县“承审员”的罗光表，命他前往小江与宋家接洽，照密函指示妥处。罗光表与宋家密商并收受“捐款”的全过程，都被宋家预伏暗室的摄影师拍入镜头。罗在完成使命返回廉城途中，突遭拦劫。罗求饶命，“劫匪”说“既不要命也不要钱，只要你身上一件东西。”搜去身上一封密信便放他走了。上述夏“县长”的名言，是从这封密信中得来。

宋家凭种种物证和经在中央军中的子弟的支持，向“专署”告发。“专员”张国元不得不下令逮捕夏秀峰了。事前用电话通知夏“县长”到东门外陈家祠堂“商量要事”。夏氏例行有马弁（警卫员）二人跟随前往。甫入门即被“专署”门

卫谎言挡回。夏秀峰入到中堂，即被拘留于神诋厅后的小楼上，楼上早安排竹榻伺候了。拘留一段时间才允许他大小老婆三人轮番探望服侍。他被捕后多方求援，无人理睬，迫得使小老婆去恳求被他免去一中校长美缺、现任“八区国道专员”闲职的周胜皋夫人，请周先生不计前嫌，代为缓颊说情。周胜皋能否做到？不得而知。官到失势则失威，失威则失志，于此可见。夏氏后被解送曲江“广东省府”法办，1949年解放前夕，举家逃港定居，生活潦倒，闻其后人因生活所迫而操贱业，他本人不留美名于家乡，父老们说这是贪官污吏的现报。

(《北海日报》1996年8月24日)

张瑞贵逃离北海的传闻

1948年1月，退役2年，在广东从化自置庄园闲居的国民党原63军军长张瑞贵，“受命于危难之中”，东山再起，出任“粤桂边区剿匪总司令”。同年9月，指挥部先后由湛江和钦州移驻北海中山东路德国楼(今市公安局)。1949年春，迁驻珠海东路属北海第一栋钢筋水泥结构高层建筑，陈济棠家族产业“永济隆”。可能因此楼后门紧接海滩，且构筑坚固，利守易撤之故。

当时，嫡系部队有薛叔达的“暂五军”，薛季良的“暂六军”；地方部队有“潮汕剿总”喻英奇的63军残部；广东保安队；钦防警察大队；海上联防队和白石盐场盐警大队等武装近2万人，麇集北海待撤海南。

11月中下旬，嫡系暂五、暂六军大部已陆续从海上空中撤退。张瑞贵所属和其他地方杂牌军未及撤走。至有“曹阿瞞割须弃袍走潼关”故事的重演。

12月4日凌晨5时许，解放军四野43军128师382团和384团先后挺进北海，迅速粉碎市区外围盐警大队的顽抗，接着兵分2路突入市区，包围攻击战略目标“剿总司令部”永济隆大楼。6时20分战斗激烈。7时20分左右，司令部竖起白旗，解放北海市区战斗结束。解放军进入司令部清点战俘，张瑞贵等高级将领失踪。

事前，专为接走张瑞贵及其僚属的军舰“古进号”已先期开抵北海，该舰在当天仍在距市区仅千余米海面上升火鸣笛，作随时开走的架势，但一直呆到5日1时才开走，说明张瑞贵等人在4日午夜前仍在陆上，是当天晚上12时左右才登

舰脱险的。事后流传有关张氏及其僚属离开司令部以后的情况，说法不一：

一说他们从司令部正门出走，穿越对面小巷从中华街绕道到外沙躲藏，呆到晚上，用黄金收买船工用小艇把他送上军舰。一说他们从司令部挖开墙洞，穿越隔壁，绕过解放军的包围圈从海滩到外沙的。又说有人在民权路口拾到“剿总司令部”，关防一颗。“证实”前门出走中华街之说。笔者经多年追踪访问所得，张氏于解放北海当天躲在外沙港中一艘小艇中，呆到晚上用黄金买渡登舰的事实，已被在后来民主建政运动中揭发暴露以及渡送张氏登舰的船工交代所证实。但他离开司令部出逃外沙的路径，绝不可能从前门绕道，因为解放军严密的包围火网，连苍蝇也难穿越；且正门并非捷径，又容易暴露。可靠的说法是挖洞穿越隔壁，绕过包围圈从海滩潜往外沙；而且化装成搬运工人模样只身出走。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不但符合情理，而且有当日进入司令部搞善后工作的一位老同志，亲眼看见张氏等人出逃所挖的墙洞可证。至于说遗落关防一事，毫无物证，纯属子虚乌有。值得探讨的是，与张氏同时离开司令部的高级将领何经贻和黄宝德2人如何避过解放军的搜索和他们怎样离境的？至今仍属不解的谜团，总之，张瑞贵离开大陆的仓皇狼狈情形，实罕其例。

(《北海日报》1996年11月30日)